

目录

上 篇

第一章 钱鍾书和他的父亲 003

- 一 钱基博其人 003
- 二 童年时光不寻常 015
- 三 超越钱基博 018

第二章 清华师友间 022

- 一 罗家伦慧眼识英雄 022
- 二 清华杂俎 024
- 三 钱鍾书与叶公超 031
- 四 钱鍾书与张申府 035
- 五 与杨绛恋爱结婚 038

第三章 钱鍾书与吴宓 042

- 一 吴宓其人 042
- 二 钱、吴之“和” 045
- 三 文字因缘 050
- 四 钱、吴之“异” 053

第四章 光华大学一讲师 061

第五章 留学时期的交往 066

- 一 伦敦:钱鍾书与向达 066
- 二 巴黎:钱鍾书与许思园 069
- 三 寄稿:钱鍾书与朱光潜 074

第六章 归国复湘行 077

- 一 钱鍾书与冒效鲁 077
- 二 在西南联大 080
- 三 湘行:由上海到蓝田 085

第七章 湘西穷山中 090

- 一 所谓“国师” 090
- 二 在国师的生活与交往 098

第八章 海上鸿爪 105

- 一 正是淞滨鱼烂时 105
- 二 老辈视他为敌国 107
- 三 沪上新雨连旧雨 113
- 四 出访台湾与暨大任教 119

第九章 关于《围城》 123

- 一 出版与反响 123
- 二 “学人小说”驳议 129

三 坐在钟摆上的人 133

第十章 五十年代 142

一 迁居北京 142

二 与卢弼的文字因缘 146

中 篇

第十一章 《石语》:钱鍾书与陈衍 153

第十二章 钱鍾书与陈寅恪 168

一 “中体西用”与“融化中西” 168

二 “诗史互证”与“史蕴诗心” 179

三 “自由思想”与“优美文学” 191

四 “文学家”与“史学家” 196

第十三章 钱鍾书与张荫麟 200

一 张荫麟其人 200

二 南能北秀忝并称 203

三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 206

下 篇

第十四章 从文本角度看 217

- 一 小引 217
- 二 词与史 218
- 三 史文:事义文三维结构 223

第十五章 文学化的史书 229

- 一 词章家法 229
- 二 小说家法 236

第十六章 反文学的史理 242

- 一 基本原则 242
- 二 史文规则 251

第十七章 主客交融下的史文 260

- 一 诗的转向 260
- 二 客观主义的失落 266
- 三 史学的客观性 275

附记 280

上

篇

SHANG PIAN

第一章 钱鍾书和他的父亲

一 钱基博其人

钱祖耆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钱鍾书的父亲钱基博排行老三。他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学问淹贯的著名国学大师。

清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二月二日,钱基博与胞弟钱基厚孪生于无锡城内连元街吴氏住宅。郑逸梅《艺林散叶》第1968条:“梁溪钱孙卿与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第2843条:“钱基博面有痘瘢,侏儒无威仪。”

“面貌相类”以及个头不高,从《公言别集》与《无锡光复志》等书所附照片,大体可以确认。至于“无威仪”,就难说了。杨绛说过,钱基博总是“一本正经”,那也许算得有“威仪”。不过,人不可貌相。孔圣人不就生得很丑陋吗?使钱基博兄弟自豪的是,两人与据称是美男子的亚圣孟轲出生在千年之后的同一天,可引为旷代相知。而凡俗与圣智之异,在心不在迹。感冒发烧闹肚子上厕所,神、人莫外,但一扯到精神,那就要分庭划野了。

钱基博别号潜庐,字子泉,又字哑泉,号老泉。他最佩服清代广东番禺学者陈澧(兰甫,1810—1882)所著《东塾读书记》一书,故自署其著书之室曰“后东塾”,号称“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对家庭、对自己,他都非常得意,总是在字里行间充溢着自豪感:

博年五岁而受经于父。十岁,毕九经。十二岁,学为文章于先仲世父,性已颀愚。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徵也。博胚胎前光,早承家学,父诒兄诫,不离于典训,斐然有述作之志。锐思毫芒,潜神默记,恒十四年,年已二十五。

这段25周岁(虚岁应是27)时说的话,成为他的终生信念。所讲事实,可与他那篇有名的《自传》相互对照。这篇《自传》谈到他早年求学经历是这样说的:

五岁从长兄子兰(即钱基成,钱鍾书的大伯父)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而于历代地名,必按图以索,积久生悟,因以精通顾祖禹(1631-1692,无锡人)《读史方輿纪要》一书。

杨绛则说:“鍾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鍾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鍾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鍾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鍾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难怪当代出不了国学大师,现在的孩子都不挨打了嘛!

差不多所有国学大师的学问根基都是十岁前奠定的,钱基博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有些人一旦成为国学大师,就不用功了,而钱基博一生都用功。由于受时代激荡,他早年也受过新学问影响,这一点钱鍾汉有明白说明:

我伯父没有得过清代的任何科举功名。因为出生较晚,到他可以应举考试的时候,科举已经废止,因此科举功名中最起码的秀才也没有考得上,但曾从师学过做八股文和写古文,有位举人许国凤老先生就是他最后一个投卷改文章的老师。他也没有进过当时的新学校取得正式学历(按老泉反驳某人攻击他以“人民造国××年”为文章末尾纪年方式,曾说:“仆前清末青一衿,而溥仪又不事我为师傅,生今之世,由今之道,不以人民造国为纪年,将以宣统复辟为薪向乎?”)他少年时代对学习古文和旧国学十分勤奋努力,以求学业成就,上进有路。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新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并参加当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先驱人物杨荫杭等所办的“理化会”学习自然科学,因此得凭这一门学科,担任一个小学的数学教员。

钱基博19岁的时候,曾约集一些有共同兴趣与爱好的年轻人组织理科研究会,聘请科学家华实甫等人做老师。毕业后,又建立理科学堂,还受近代著名人物薛福成之子、无锡巨公薛南溟(翼运,1862—1929)之聘,为薛的儿子讲授查理·斯密所编《小代数学》。但是,这位小学数学教师钱基博的儿子钱鍾书,对数学却天生一窍不通。

当然,钱基博终究是一位文史学家,不是数学家。他的数学知识,充其量,也只是超过他的英文翻译水平。不过,我们由此可以说,他早年确实受过“科学思想”的影响。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民,而不是满清政府的遗少。所以,他热爱中国文化,但可以不爱某个王朝。18岁时,钱基博作了一篇题为《中国舆地大势论》的文章,约四万言,向梁启超主办的鼎鼎有名的《新民丛报》投稿,得到刊登,并由梁启超亲自写信给他,表示赞赏。后来,这篇文章还受到《广益丛报》的转载。但是,文章却受到于右任(伯循,1879—1964)严厉批驳,并成全于氏与梁任公成为好朋友。这件事多少反映出梁任公的一些做人风格:东西南北中,无不是朋友。但不论怎样,这篇文章标志着钱基博投稿生

涯的开始。他按照己意阐发文章利钝,依照陆士衡《文赋》的模样,撰成一篇《说文》,刊登在邓秋枚(实)主编的国粹派刊物《国粹学报》上(老泉在该刊仅载此文,却喜欢提起),开始取得文名,成为本地一位受人注意的古文家和国学家。据钱鍾汉说,钱基博在尔后的日子里,便由廉泉(惠卿,南湖)推荐,被江西省布政使陶大均聘为专主文稿的师爷,月薪银百两,当时年龄不过二十三岁。“他这样年轻,既无科举功名,又未进过正规的新式学堂,能得到这样一个优厚的政治职位,确可算得少年得意了。”不过,照钱基博自己的说法,意思、语气又有所不同:“顾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睹其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招之入幕,从容讽议,而不责以治事。大均早年受业遵义黎庶昌,于湘乡曾文正公为再传弟子,好诗古文词,独许基博文,以为得曾文正所谓阳刚之美。月薪白银百两,尤为优贍,而基博悉以奉父,衣冠敝旧,不改于初。或问何自苦乃尔,或亦誉为少年老成,而基博则应之曰:‘余年少,又自知嗜欲过人,稍一纵恣,恐回头不得;今手中不留一文钱,欲束身自救以不入于悖淫耳!’同幕作客,咸有所欢;或逢宴会,挟以娱喜,合尊促坐,男女同席,而基博捧杯微饮,神志湛然。”这段话直把自己捧到道德的虎背上,想下也就下不来了。但他年轻时修身涵养确实很深,并非自卖自夸,比如他讲的下面一个故事:

1910年的一天半夜,钱基博正在酣睡,陶大均派人来叫他。他急忙披衣起床,来到大厅,但见灯火闪烁,幕僚纷侍,大均指着一个漂亮女人对他说:“这是花榜状头,大大有名,白天怕人议论,所以晚上招来叫大家开开心,你快去看看。”基博默然,徐徐才说:“你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却半夜三更公然与妓女胡闹,请问你如何仪刑百僚?”说罢,即急步而出。同座哗笑,觉得这真是一个迂儒,陶大均忙止住大家:“别这样,此君子!”第二天,两人见面,大均致歉说:“君少年如此,真令我辈愧死!但是除了你无人敢劝我,除了我也无人能容你!”从此不再召妓。

就是说,这件事恰好发生在钱鍾书出生那年,足见青年钱基博的“一本正经”。这种“一本正经”,既是家庭教育使然,也是自身修养的结果,还是自我表演的需要。一个人将道德修养看作是自己强于他人的优势所在,往往就利用这种优势进行自我表演与自我欣赏,这种自我表演反过来又会强化他

的优势。假如这种人突然有一天会越出自己的语言天地而从嘴里蹦出“失恋”之类字眼,就会让人觉得“生涩拗口得很”。所以,做善事并不难;做善事而欲人知,更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做好事不留名,才算得超凡入圣。钱基博终归未脱人的基本根性。

不到一年,陶大均突然得病死了,钱基博只好离职回到老家。据钱鍾汉说,钱基博回乡后,到侯鸿鉴(葆三,1872-1961)创办的竞志女学(1905年开学,现为无锡市第十二中学)担任了一名国文教员。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无锡也响应起义,得到光复。由于钱基博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以及他本人的社会经历,他对辛亥革命并不一定欢迎,但也并不反对,到革命取得一定成功后,也能跟着潮流,参加一定的工作,表示赞助。同时,由于和秦毓鎰(效鲁,1873-1931)一起发动起义的同盟会会员孙保圻,参加军政分府担任财政部长但并非同盟会会员而在地方上拥有实权的孙鸣圻,担任军政分府民政部的总务课长、并经常代行部长职务的另一个同盟会会员孙靖圻,都是钱基博外祖父家的;和秦毓鎰一起发动起义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钱鼎奎(相伯)、吴廷枚(锦如)都是他竞志女学的同事,吴廷枚还是钱鍾汉母亲的舅表兄(钱基厚的岳丈是吴的姑父),与钱基博有姻亲关系,加上秦毓鎰本人拉拢他,所以,军政分府的一些重要文告和碑记,都委托他起稿。辛亥革命起义军攻下南京后,当时又一同盟会无锡籍会员顾忠琛(道生,1860-1945)担任江苏起义军的淮北援军总司令,曾邀请钱基博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后来,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顾忠琛所部改编为第十六师,顾忠琛任师长,钱基博即任师部参谋,随军同行。当部队驻军镇江时,一个夜间,有某营士兵哗变,师长不在驻地,情况非常危急。钱基博主动承担责任,连夜进行布置,稳定其余部队,平息了这一事端。钱鍾汉说,无锡光复后,钱基博确实曾经赞助和实际参加过辛亥革命,可是他对同盟会、国民党和辛亥革命,基本上并非真正赞同、拥护,“因而对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很难完全避免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挑剔、指责,对革命党人对封建地主势力的妥协,则表示欣赏。”这就是钱基博撰写《光复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所以,在南北议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不久,他就立即脱离十六师,回到无锡第三师范担任教员,以

表示从此退出政界。直到袁世凯企图自己做皇帝,打击各地国民党势力,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秦毓鎰为袁世凯政府逮捕入狱,地方最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旧势力乘机群起攻击秦毓鎰,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他才出于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又为秦毓鎰抱不平,所以写了《光复志》这部著作,为无锡光复起义和秦毓鎰主持公道,求得事理之平。因此,“尽管作者对辛亥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如上面所述,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比较力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本来面貌,也为我们后人留下比较系统的有关文字史料。”钱鍾汉的叙述可谓公正客观,值得称道。

钱基博本人也曾讲到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而且格外绘声绘色:“迨辛亥军兴,同县顾忠琛方以苏浙联军总参谋,攻克南京,延治军书。历任援淮军司令部陆军第十六师副官参谋,授职陆军中校,调江苏都督府。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吴禄贞传》,席地为草;文出,一时传诵,咸以为传神阿堵,如见生平也。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者罔不恣意声伎以歌舞升平。迨日之夕,军部寂无人焉。基博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卫兵值守门外,未尝不窥而怪焉,或指语以为笑乐。既而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失败,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知其素长者无与,又有诤议,皆以秘书为招。”

不过,钱基博天生不是当官材料,而是书生种子。他深感自己已奉职于南方军府,大丈夫立身行世不容反复无常,“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眼瞅着世乱方兴,国难未已,一介书生,飞书走檄,终不过以文字为军阀们作口舌,能有多大意思?“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非所思存”,所以,他毅然谢绝了赵秉钧、冯国璋两位大人物的招邀。

这时,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正缺少国文教员,校长顾祖瑛有意聘请他,但一想到月薪只有20元,每星期任课却高达24小时;钱基博文章有高名,自20岁奔走大江南北,月薪常在200金以上,加之又有赵秉钧、冯国璋的聘请,所以深感自己的庙小,怕容不下钱基博这尊大佛,见了钱基博的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钱基博见状,笑着对他说:“君何浅之乎测我也!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何所不足于我乎!”于是欣然就任。刚到学校的时候,顾祖瑛又担心他才高意广,敷衍塞责,不肯认真卖劲,不承想钱基博熟讲勤改,格外卖力

气,弄得小孩子个个顺心,而且在职两年,未尝一日旷课,顾祖瑛不禁大喜过望,钱基博本人也颇为得意,常对人说:“我从前月薪二百,往往萧然块处,觉得没有意思,而今舌焦口干,从早晨到晚上忙个不停,反而觉得心里安详。呜呼,我总算找到归宿了。”从此,他委身教育,著书立说、培养学生之外,再也没有做过别的。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武昌华中大学(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等。主要著作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文选类纂》、《模范文选》、《版本通义》、《后东塾读书记》、《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名家校读五种》、《文心雕龙校读记》、《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近百年湖南学风》等。另有各类散篇文字,杂见于《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新教育》、《清华学报》、《甲寅周刊》、《青鹤杂志》、《光华大学半月刊》、《国师季刊》等刊物,可谓著述等身,名不虚传。钱穆先生晚年曾说,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劲的学者,就是钱基博。尽管钱穆的回忆录错误不少,钱鍾书甚至说其中关于他的记述“全错了”,但他对钱基博的赞誉,却不是瞎吹乱捧。

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钱基博是一位很地道的学者。谈到做学问,他底气十足,自负极了: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闾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而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牘,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所徵见,足备异日鉴戒。论说书牘,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澹之

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

他还声称自己曾以十年之力专治姚氏《古文辞类纂》一书，撰有解题，断言并世之治姚氏书极深研几而如他者，“当亦不多觐”。正因如此，骈文高手李审言才批评他只知“牢守一部《古文辞类纂》，而不知高谈汉魏”。在陶氏幕府做门客的日子，钱基博每天都吟诵韩愈的文章，成为定程。李审言作文章，先要吃人参、附子之类补药，每文底价标明三百元，上不封顶。钱基博却从不搞这种名堂，有人来索文章，兴到则为之，随意挥洒，佳则神来之笔，不佳则本不取润酬，无所谓等价交换，而一成则不改，郑孝胥所谓“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也。时而点缀一二村俚俗语，佳致平添，听人诤议、赞许，也不加喜戚于其间，以徐俟五百年后之论定。书信频至，时有应有不应。不过，他也肯说出自己文章的不足：“自谓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迂、愈，雄厚有余，宁静不足；密于综核，短于疏证。”文字不够轻盈。

在性格上，钱基博特立独行，清介绝尘，独行高蹈而修身谨严，几乎让人挑不出半丝半毫毛病。从他身上，可以瞧见钱鍾书的若干影子，而钱鍾书实在比他“艺术”得多。早年，钱祖耆对钱基博约束甚严，“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沽声名也。”钱基博自觉自愿地全盘接受了钱祖耆的思想，牢守不移。他在学校讲学，“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阿世。”真可谓能得“圣人”之精微，把“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得天衣无缝。他信守的“道”，就是道德上人格的完美，并始终把这种完美人格之理念作为为人处世、治学著述的最初出发点、最终归宿点以及主干核心点，从而使他本人在道德使命感驱动下俨然成为人类道德行为的评判者与标准楷模。凡是不符合他那原则的人或事，他自然看不惯，忍不住要讽议、要批评、要骂上几句。他曾这样说：“学潮激荡，长傲纵欲，

大师或相谗随以与为亡町畦。而基博所至,则常思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每太息曰:‘昔人媚道以干时君,人知其佞矣。而今之大人先生,乃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我其谓之何哉!’”因此,他严气正性,从不与学生嬉皮笑脸,没大没小。每到教室,危言激论,大声发于座上,时而也来一两句调侃,杂以诮嘲,说几句笑话;吟诵课文,为的是启发学生多提问题。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虽持论侃侃,而历小学以至大学,却很少遇见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坏学生。

民国元年二月,蔡元培、吴稚晖发起成立“进德会”,认为革命必先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怎么个“不为”法呢?他们把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另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两条;丙种,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汪精卫、宋教仁等名流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钱基博也参加了。但他认为最好不要吹牛皮、说大话,免得日后打嘴,所以只以“不吸烟、不赌博、不狎妓、不纳妾”四条自我约束。该组织的徽章是白银心,悬在胸前:“银以徵其纯洁,心以警其良知,蕲于精白乃心而已。”结果怎么样呢?真该着叫钱基博说嘴:“当日以大力者登高之呼,而纷纷籍籍者,胥以入会为荣;迄今二十四年,而澹与相忘于无何有之乡。诸公衮衮,纳妾者不可以更仆数,其他细德出入,更无论矣。独基博龌龊小儒,乃不敢犯戒耳。”钱基博感慨良深地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而今之所谓名流者,亦既流宕忘返,骛名而不课实;言满天下,而有遗行,适见其为小人之的然而已!吾畏之、远之而不欲接之!”不消说,他是以君子自许了。而小人呢,自然没有随着现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而减少,他老人家的感慨是白发了。钱基博先生是位理想主义者,所讲的也只是一种理想。不用遍观古今中外,就可以知道:世界上永远是君子受气,小人得志;不但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而且道义面前也是人人不平等的。扣个帽子:老人家的历史观有问题。只是,我辈宁做受气之君子,亦不为得志之小人而已。性格即命运,我辈宁愿受命运之摆布。

章士钊(行严,1882-1973)是近代出尽风头的大名人。他善持政论,笔锋甚健。钱基博看不上眼,便去信规劝。信中说:“昔人连称名德。名者,公所自

有；德则愿以交勉！独念民国肇造，谈士蜂起。尚集权，则兆洪宪之帝政；言联邦，又启强藩之割据。民亦劳止，汙欲小休。而文士之笔杆，乃与武人之枪支，同恶相济，祸国殃民，然后知诸葛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为高识。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倘少主张，即少纷纭。公热心人，顾献此一服清凉散！”武夫以枪杀人，文人以笔害命，貌异心同，殊途同归。后来，钱鍾书则大骂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与《逻辑指要》。



章士钊

学问大了，接人待物自然别具一格，这其中似乎有某种连带关系。钱基博讲到自己时，曾说：“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文章只以自娱，而匪以徇声气；学道蘄于自得，而不欲腾口说。不为名士，不赶热客；则中侠肠，孤行己意，而不喜与人为争议，人亦以此容之。饱更世患，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这差不多也就是他大儿子钱鍾书的自写照了。

虽然钱基博自称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毁誉，实际上，天下根本就不存在知行合一的人。事实是，钱基博既在乎别人对他的毁，更在乎对他的誉，特别是来自前辈或同辈的毁誉。

先说对他的誉。曾国藩的孙子、王壬秋笔下的“圣童”曾广钧（重伯），摆出一副老师巨子的姿态说：钱基博“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鼎鼎大名的有钱人张謇（季直，1853—1926）也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文人费树蔚凑趣地加油说：“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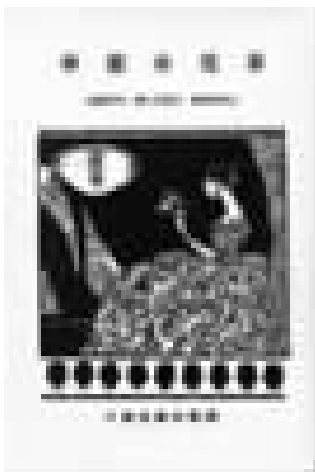
张謇

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而张謇说那话时,与钱基博并不认识。不大瞧得起人的李审言,也破例赠给钱基博一顶“能读书而下笔辄古”的高帽子。至于陈衍(石遗,1856—1937),更是钱基博的文章赏音,二人相互推服,好听的话不厌其多。钱基博说陈石遗为“并世文章之雄,自经史子集以逮小学金石目录山经地志,靡所不赅贯,随叩斯应。”陈石遗赞誉钱基博,则说:“后贤可畏,独吾子尔!”钱基博的好朋友,大都佩服他。他对这些君子朋友,也取其所长,借以自勉,曾说:节性之和,不如太仓唐文治(唐氏早年即定居无锡,也以无锡人自居);制行之谨,不如同县顾倬(1872—1938,曾任东林小学校长)、高文海;治事之勤,不如上海王宝仑、嘉定廖世承;识度之渊,不如同县徐彦宽;学问之密,不如慈溪裘毓麀(匡庐),“而文事则差有一得之长”。

再说对他的毁,在背后甩小鞋、搞小动作那种意义上的“毁”。当我们读钱鍾书那篇著名文章《林纾的翻译》时,总会得到一个印象:钱鍾书对林纾(琴南、畏庐,1852—1924)评价挺高的。甭说别的,单说林纾其人,一句洋文不懂,一辈子没开过洋荤,却译出一百八十余种西洋小说,且时而能作出挺地道的评论;无本生意,红红火火,还不使人惊叹吗!而有些出过多次洋的、在外国居住年份很久的、精通外文的、极受推崇的人,例如晚清的外交官张德彝,倒可以对外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这可真是不合情理的天大笑话,但又不折不扣地是事实。这个事实,虽然意味深长,倒也不足使眼下在西方打工留学的半文盲们降价,因为跨出国门的,即便为蛇头包办,想必也是“优秀人才”;更不足使国内的“土包子”长脸,



林纾



林纾翻译的小仲马作品书影

因为留在国内的,即便精通西学,也得低人一等,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可林纾偏偏具有闭门造车、出则合辙、歪打正着的本领,证明了艺术超越时空的特性,即中西文学的内在统一性。林纾对西洋小说的正确领悟,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修养,而不是得益于他的西学知识。这样一来,帮助他从事翻译工作的外文专家,由于不具备他那样的国学修养,只好都成了大冤桶。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那些海外归来、自骄骄人的赤子们真可以深长思之了。正是钱鍾书笔下的这位林琴南,对钱鍾书的父亲进行了倾轧。



恽铁樵

原来,在常州文人恽铁樵(名树珏,一署焦木,又号冷风、黄山民)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刊登了林纾的小说和笔记《技击余闻》,同时又征得钱基博的小说《技击余闻补》,在《月报》上连载。有位读者极力赞誉钱基博的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纾之上。不想这个消息被林纾知道了,感觉丢了面子,老大的不高兴,并立即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赌气加要挟地说:“此后愿让贤路,不再贡拙。”编辑部从经济效益考虑,觉得林译小说在社会上销路甚好,现在既然两贤相厄,衡量轻重,还是林纾不能得罪,于是就对小人物钱基博采取了“宕塞”的态度。据说,恽铁樵为此还“大为不平”来着。可事情并没有结束,据说林纾还叮嘱商务印书馆不出钱基博的书;有朋友介绍钱基博到北京某大学担任一个职务,林纾也从中讲坏话,把好事搅和黄了。这样看来,林纾实在不大懂得如何做人。以他一大把年纪(比钱基博年长35岁),干出这种不是东西的事,无论胜败,总是不划算的。至少提携后进的高帽子,被他自己扔掉了。在背后搞晚辈学者的小动作,真是愚不可及。倒是钱基博,事后做出一副高姿态,教训死去的林纾同时表扬自己说:林琴南气局褊浅,“十五年前(1914年),以博偶尔倚掖(所谓‘补’是也),见之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